

■名家茶座

■私人相册

调研当学周总理

开河

□张桂辉

□刘向东

调查研究，既是工作方法问题，也是工作作风问题。重视不重视调查研究、善于不善于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履职能力强弱的“分水岭”、作风优劣的“晴雨表”。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周恩来扑下身子调查研究的一举一动、一点一滴，感人至深，发人深思。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我们党的百年实践证明，不论是革命战争，还是经济建设，抑或是改革开放，但凡做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决策部署、科学决策，都离不开调查研究。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近新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搞好调查研究，很

重要的一点是，就要像周总理那样，眼睛向下，人到心到。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全国各地发生了触目惊心、大饥荒。大病初愈的周恩来，一路风尘来到河北邯郸，通过四个昼夜的深入调查、去伪存真、深刻思考后，含泪向毛主席作了详细电话汇报。之后，中央作出了调整有关政策、取消集体食堂，实行分户吃饭的英明决定……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90多年过去了，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从来没有丢，一直在延续。这，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然而，在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有的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有的前呼后拥、兴师动众；有的装模作样、流于形式；有的道听途说、浅尝辄止；有的爱进富裕人家、怕去贫困农户……。人到心不到，转悠一阵子，洋洋洒洒的《调研报告》，

既缺少有价值的例证、有力度的分析，更缺乏有哲理的阐述、有见地的对策。这样的调查研究，不单没有收到多少实际成效，而且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有这样一组镜头：一天，周总理来到一个单身老汉家，独自坐在门口的矮凳上，与对方亲切交谈，一外一内，一问一答：“多大年纪啦？”“六十五岁。”“是虚岁吧？”“是，1897年生人。”“你比我大一岁，你属牛我属虎，我们是同一时代的兄弟。”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与一个贫困潦倒的小村贫民，平起平坐不说，还以兄弟相称，瞬间打破了彼此间的隔阂，什么真实情、什么掏心话也能听到。反观当下少数领导干部，或多或少滋生了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长官意志。反映在行动上，不同程度脱离了人民群众，有意无意的背离了群众路线，开展调查研究时，走走过场，做做样子。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长期以来，党的

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向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带头开展调查研究。社会发展了，时代不同了，优良传统不能丢。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充分认识、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更要学会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主题，但凡下基层调研，务必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不要迎来送往，不做蜻蜓点水。而要像周总理那样，放下架子、俯下身子，人到心到、耳目并用，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调研成效，培育并养成优良的工作作风，夯实并提升科学的执政本领。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新时代，新使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要注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搭准群众脉搏，真正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放在心上。其中，一个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前提是——努力做到、自觉做到“眼睛向下”。各级领导干部，不论职务多高，不管工作多忙，都要自觉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要学习周总理，责任在心、一沉到底，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扎实开展调查研究。

所谓开河，也叫疏浚，就是将河道分段拦截抽取河水，再挖除影响通航的淤泥。一来可保证河道畅通，二来淤泥用作田间肥料。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住的松江县天马山部队营房后有条可通行船只的河道。这条河的周围都是农田，尤其是收麦或割稻时，装满作物的水泥船来来往往，分外热闹。而到了冬天，如果河上不见船只，那就是要开河了。但那时的我们正是顽皮的少年，所期盼的开河并不是去看热闹，更不知开河的辛苦，而是惦记着河水见底时的那些鱼儿。

那个年代弘扬的是军民一家亲，每逢农忙或冬季开河，驻地部队总会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有次，父亲集合了两个连的战士，腰扎武装带，斜挎水壶，肩扛铁锹，雄纠纠气昂昂地出发了。一听说是去帮社员们开河，我们几个伙伴便立即带上捕鱼工具紧跟而去。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热闹又壮观的场面。当时我和玩伴们还特地站到河堤高处，似如检阅开河的大军。只见河两岸红旗招展，河堤上竖着毛主席巨副画像和“农业学大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大牌子。河道里人山人海，岸边残雪斑斑，快要见底的河上还飘浮着寒气逼人的冰渣子。可那些铲泥的、装筐的、挑担的个个头冒热气，有的干脆脱去了棉衣。而彼此的呼喊又像是力量的注入，甩开膀子你追我赶的热火场景与“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歌声和“嗨呦嗨呦加把劲呦”的号子交织在一起，仿佛奔腾的河水在宽阔的河道间起伏荡漾。这时，我们也不怕一脚陷入河泥里，瞅准积水处那些惊恐万状的鱼儿，先用篮子并排挡着，再用竹竿击水追赶。见鱼儿慌乱地窜至篮子处，等着的伙伴迅速提起篮子。尽管开河前生产队抽水时用鱼网已捕了一遍，但我们依然能兜起一些漏网的鱼儿。稍大的我们就躲到不远处的桥上烧烤吃，那焦香的味道真真是惬意无比。从那以后，只要听说哪里有开河，我们就决不放弃，因为趁机捕鱼实在是刺激又实惠的开心事儿。

前不久我重访故地，父亲的军营经几番改造已不再有曾经的印记，但营房后的河道却风采依旧。清凌凌的水上倒映像着的一排排绿树一片片芦苇和蓝天白云时而清晰如画，时而影影绰绰，时而又幻化成了当年父亲带领战士和社员们开河的壮观景象。

■并非闲话

心头有朵焦虑的云

□刘兴雨

明眼人一下子就会看出，这个题目是从我国台湾的一首歌化来的。有人可能会嘲笑，这小子已经江郎才尽。但我要提醒一下嘲笑者，此云非彼云也。

焦虑的云并不像黄山或庐山的云，当然也不是台北那朵雨做的云。自然的云是一种奇异的景观，如大海波涛，蒸腾翻涌、气象万千。而焦虑的云是罩在人们心头的东西，人人能感觉到，却捕捉不到。你就是把孙悟空派出来，瞪起火眼金睛也照样看不见。

它往往不是轻飘飘的，而是沉甸甸的。不是清风朗月时分的云，自由自在、无忧无虑，而是暴雨将临一般，浓浓的一片。

假如你家有个孩子，你就会有所领教。孩子没上学，想找一个好学校，如果家住学校半径之外，就要想方设法把户口弄到半径里。实在弄不进去，就要拿择校费，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孩子进了学校，就套上了小夹板，各式各样的题好像永远也做不完。

一次次的考试就是对心理的一次次折磨。考好了固然皆大欢喜，稍微退步一点，就让家长坐卧不安。孩子的一生就悬在那成绩单上，谁敢听之任之。早上早早起来给孩子做饭，小时候还要送他们到学校门口。晚上不但要做好饭菜，还要陪孩子写作业，一陪差不多就是半夜。

好不容易关关夺隘过了拥挤的高考独木桥，刚想好好喘口气，马上又要筹集上学的各种费用。哪个家长不是宁可自己受苦，不愿孩子受憋。没几年工夫，孩子又面临分配，这一关并不比高考好过。这个桥上挤得更厉害，并不是你成绩好就能有一个好岗位。高考时家长有劲使不上，这回你那使不上的劲尽管使。可有时依然使不上，只好报片，败下

阵来，让孩子继续摸爬滚打，谁让咱没能耐了。

孩子也并不轻松。家长的全部希望在自己身上，学习的竞争比起奥运会也相差无几。光是家长的希望还可以承受，每次考试之后的大榜，几乎让人感到有只狼在后面追赶。测验题、模拟题铺天盖地，像大海里的浪涛，这一道刚涌过去，另一道又扑上来。许多人整天感到沉重的压力，原来活蹦乱跳的孩子，弄得无精打采，甚至小小年纪竟至抑郁。家长们的压力他们虽然不用承担，但他们心头的压力一点也不少于家长。

如果单单是培养孩子成才倒也罢了，还要管他们成家立业。成家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房子，面对像胡子一样疯涨的房价，那像眉毛一样长的工资就有点杯水车薪的感觉了。可你又不能袖手旁观，只好拼尽老命为他们筹办房子。这时那房钱就成了压在心头的云。

等给孩子的事情答对的差不多了，还要顾及自己的职称和升迁。幸运儿总是少数，一切还要靠自己打拼。而那晋级的路和升迁的路不是长安街的马路可以畅通无阻，倒是像华山的路只有一条，而且狭窄不堪，由于狭窄就难免拥挤。由于拥挤，有些人就要走捷径，就难免发生挤踏。

这还不包括你意外生病，不包括你一心打拼时家庭内的种种意外和纷争。这些意外和纷争哪一件不让你牵肠挂肚或者撕心裂肺？哪一件不让你焦虑？

多年前，有人将国人的心态概括为浮躁，而今，似乎应该概括为焦虑了。不但百姓焦虑，官员也焦虑；不但男人焦虑，女人也焦虑；不但生活不好的焦虑，生活好的也焦虑。

人说：心大了，事就小了；心小了，事就大了。但愿每个人都能心大一点。不然，谁受得了焦虑那黑云压城般的折磨。



■灯下漫笔

追求“无垢的利益”

□沈 栖

商才，即所谓小聪明，决非真正的商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涇泽荣一在商界提倡“士魂商才”。按儒家的界定，有天下情怀和道德理想者为“士”。在他看来，倘若商人以“士”为“魂”，自然就远离了铜臭、摒弃了欺瞒。这位巨商一生以“无垢的利益”为信奉圭臬和追求目标，身体力行，即使70多岁从商界隐退后，还资助了600多家教育机构和公益团体。

其实，“义利之辨”在商界是始终存在的，且不分国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涇泽荣一倡导的“无垢的利益”也应该是我国广大从商者（生产厂家和销售部门）追求的主臬。纵观我国当下的商界，相悖“无垢的利益”现象诸多：或只知道“拨算盘讲利”，不讲从业的德行涵养；或整天沉湎于丰屋美服，骄奢淫逸，而置社会责任于不顾；或以次充好，牟取暴利；或侵犯专利，肆无忌惮推销“山寨”产品；或坑蒙拐骗，欺诈骗客；或任意摆阔，大把大把撒银烧钱；甚或官商勾结，行贿官员，与“权力寻租”媾和，蚕食鲸吞国家财产。清代道

光年间的徽商舒遵刚曾用泉之源、流的比喻说明“道自财生”的妙处：“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同治：《黟县三志》）他批评商业经营中的狡诈者、吝惜者、奢侈者，看似精明，实为自竭财源、阻塞财路，故主张“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注重疏流，“以裕其源”，行大道求大利。他尽管仍以聚财致富为目的，但毕竟把道义制约和伦理规范引进了商业经营活动。

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是辩证论述“义利之辨”这一商界“永恒主题”的权威：其《国富论》科学论述的是“利”，而《道德情操论》则以“义”为要旨。他晚年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新加了这么一段话：“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产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产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毋庸置疑，涇泽荣一追求“无垢的利益”委实是“通往美德的道路”。